

“史坛斗星 仰韶四期 两体系 重瓣花 覃研作钥匙 久溯源流江河远；专业师表 桃李满门 全身心 多维观 鸿制归琅环 空怀道范岳峻深。”长长的挽联诉说着无尽的哀思。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原考古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于

2024年4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严文明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和考古学教育家，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体系的创建者、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引领者，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严文明： 用哲思与诗意解读“何以中国”

（一）

严文明先生一生致力考古研究，主持和参加了河南洛阳王湾、陕西宝鸡周原、山东长岛北庄、湖北天门石家河、河南邓州八里岗等重要遗址考古发掘，大力倡导聚落考古、环境考古、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研究。

仰韶文化是严文明先生的学术起点。他重新梳理了仰韶文化遗址的材料，通过类型学和地层学，将仰韶文化的发展整体划分为四期两大阶段，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基础。从对仰韶文化的研究开始，严文明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把钥匙，探索出从典型遗址入手深入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有效范式。在对中国史前文化的系统研究及农业起源研究的基础上，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严先生提出了“重瓣花朵”的论断，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他形容为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其周围的甘青、山东、燕辽、长江中游和江浙文化区是第一层花瓣，再外围的文化区是第二层花瓣。这三重结构组成的花朵，每部分之间都紧紧相连、不能分离，具有文化上高度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以“重瓣花朵”格局的提出为代表，严文明先生上下求索，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揭示了中华文明产生、发展和绵延的密码。

严文明先生爱写诗。对他钟爱的遗址，他都会写一首长诗，于是有了《良渚颂》《凌家滩之梦》等。“太湖文明五千年，崧泽良渚踵相连。开辟沃野千百里，首创石犁耕稻田。莫角山上建殿宇，汇观瑶山祭昊天。防洪先建塘山坝，御敌高筑大城垣。卞家山下架船坞，沟通钱塘到海边。陆上远通高城墩，寺墩赵陵与福泉……”良渚古城遗址的重要发现者刘斌教授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良渚考古在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等一系列的重大发现，都离不开前辈先生们的指导，每个发现都会有先生们的身影。2002年浙江省政府聘请了严文明、张忠培等12位先生作为良渚遗址考古的专家咨询委员，在考古现场、开会等学术讨论中、吃饭或者晚上的茶叙中，都可以感受到他们治学做人的风范。

“先生们不仅教我们做学问，他们更是我们做人的楷模。几十年来我们这一代是在先生们的教导帮助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中国史前考古的文化谱系是在先生们的带领下创建起来的，探索中国早期文明的道路是在先生们的引领下走出来的，严文明等老一辈考古学家不仅是中国考古的奠基人，更是中国考古学队伍的缔造者，如今的中国考古人有谁不是他的学生呢？”刘斌说。

记得2016年，“上山文化”命名10周年暨稻作农业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山举行，严文明先生来参会。在会议上，他说，浙江的遗址很有意思，“从美丽的小洲（良渚）出发，过一个渡口（河姆渡），跨一座桥（跨湖桥），最后上了山（上山）。这是一条通向远古的诗意之路。”听者无不赞叹先生的妙语。



严文明先生

来源：北京大学官网

（二）

严文明先生是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对国外考古学理论的各种流派，保持开放心态，密切关注国外考古学实践成果和方法技术创新。提倡考古领域的国际合作，并身体力行先后组织并主持了中美合作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中日合作桐乡普安桥遗址等发掘研究项目，探索形成了中外合作考古的工作机制，推动了中国考古的国际化，拓展了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重大问题研究的国际化视野。

严文明先生致力于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对文化遗产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担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和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期间，参与了多批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评选和遴选工作，参与指导了三峡、南水北调等一批重大文物保护单位，对我国文物保护单位制度的探索与建立也给予了充分指导。他关注大遗址保护利用，支持倡导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论证了余杭良渚、广汉三星堆、秦安大地湾、朝阳牛河梁等一批重要遗址保护规划，指导了余姚河姆渡、陕西宝鸡周原、江苏无锡鸿山等大遗址保护展示。尤其是担任中国大运河保护规划评审组组长、受聘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为中国大运河、良渚古城遗址成功申遗作出重要贡献。

“严先生的深厚学术造诣和杰出贡献不仅在国内考古学界有口皆碑，而且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尊重。去年12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五届世界考古论坛上，经过来自十几个国家的40位顶级学者组成的论坛评审委员会上，通过了我们的提议，授予严文明先生终身成就奖，可谓实至名归。”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研究员王巍说。

作为教育者，严文明先生始终致力于考古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他始终相信“中国是可以产

生考古学大师的地方”，并倾其一生为之而努力。1990年，他专门为本科生开设了新课“考古学导论”，为初入考古门的年轻人们讲“考古是什么”。上海大学教授徐坚说，1991年秋季第一次聆听严先生的考古学导论课程，从那个时候开始，爱上了考古，随后开始读严先生的仰韶文化研究，跟着一步步走向重瓣花朵。

严文明先生是纪录片《何以中国》的学术总顾问。其实严文明先生的著作和思想也是《何以中国》的创作之源。庆幸的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严文明先生于2021年4月20日和2023年7月13日前后两次在家中接受《何以中国》摄制组采访的相关视频，他指出：“中国文明的突出特征是多元一体，持续发展。我们中国人认识了自己的历史，应该对下面的持续发展充满信心！”

（三）

严文明先生在去世之前曾给《史前考古》创刊号写了一篇《寄语》，对适逢其时、应运而生而生的《史前考古》寄予厚望——“它应该聚焦中国的史前文化有哪些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色，有怎样的形成过程。我讲过中国古文化、古文明格局像‘重瓣花朵’，这应该与我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生态条件有密切的关系。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这样在自然环境中相对独立，周围的高山、荒漠、大海将这广袤的土地与外界隔离开来，内部又有各方向聚拢的中心，使得华夏古文化乃至中华文明拥有一个孕育、绽放并引领的核心（花蕊），四周又有诸多各具特色的文化体（重叠的花瓣）包裹着它，为它护卫并输送营养，于是我们才有了不间断并不断壮大的文化、文明发展历程……中华文明有个长期孕育的过程，旧石器时代文化与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一个整体，不应将二者割裂开来。在过去的考古实践中，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习惯对岸为禁区，画地为牢。近些年对李家沟、龙岗寺、裴李岗等遗址的发掘表明，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层是上下叠压的，两个阶段的文化是无缝连接的，其意义不亚于后岗三叠层的发现！把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打通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整体特点就清晰了，中华文明的源头就找到了，华夏古人群、古文化的发展脉络就明确了。”

“我本一书生，教书又育人。能力固然小，常怀济世情。潜心学考古，鉴古以观今。漫漫修远路，前途有光明！”这是严文明先生八十岁时写的几句话。

2023年底，在获得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后，严文明先生一如既往，谦逊淡然：“感谢给我崇高的荣誉，我不过勤于耕作，不问收获罢了。”

严先生常以“农夫”自比，这位“勤于耕作”的考古学巨擘，在今年的暮春，与他耕耘一生的“田地”永远告别了。而他的学生们、他的学生的学生以及更多的考古人将接过炬火，踏上“漫漫修远路”，奔向考古学更光明的远方。

（本报记者杨雪梅综合报道）

元中都遗址是河北省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时代比较单一、后期破坏最少的元代都城遗址。其发现是我国城市考古特别是元代考古的重大突破，入选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元中都遗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链接

一座中都城 半部元朝史

陈力丹文/图

元中都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白城子村西南约400米处。这是一座曾遗失600多年，1999年才又被发现的元代都城遗址。

上世纪90年代确认北羊城遗址为元中都遗址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刚登基不久的元武宗海山下诏“建行宫于旺兀察都之地，立宫阙为中都”。

“旺兀察都”即现在张家口市张北县馒头营乡一带，位于大都和上都之间的驿道上。海山要建中都，为加快进度，先后“发六卫军万八千五百人”、令“上都卫军三千人”加入，共计21500人施工。从元大德十一年七月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仅13个月建成宫城，后又加建宫城角楼、宫城外的皇城和皇城外的郭城。

至大四年（1311年）正月，武宗去世，他的弟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仁宗）继位后很快宣布罢建中都。也就是说，“元中都”作为都城仅仅3年，但该地仍作为行宫使用多年。至正八年（1358年），红巾军烧毁中都宫阙，“元中都”的概念逐渐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

随着元朝的远去，无人知道“旺兀察都”这个地名了。持续400年，元中都遗址被误认为是辽代将军白天佐的家城，俗称“白城子”。近200年，又被误认为是辽代牲畜交易市场的北羊城遗址，1981年还被列入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在1981年，张家口一中语文老师尹自先自费考察北羊城遗址，第二年在《张家口日报》发表文章，大胆提出“此城实为元代中都城遗址”。1997年，在“元中都学术研讨会”上，认定白城子遗址为元中都遗址。1998年9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单位组成了联合考古队，对“白城子”进行考古挖掘。经过考古发掘，最终作出了北羊城遗址实为元中都遗址的结论。

2001年，元中都遗址被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8年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挂牌。

为考古、古建、史学界提供多项研究实证

元中都是蒙元四都（和林、上都、大都、中都）中最晚的一座，代

表了当时的建城理念和建筑水平。笔者来到元中都遗址正值中午，骄阳之下天高气爽，几片白云衬托着湛蓝的天，从南到北成纵向长方形的巨大郭城、皇城、宫城遗址尽收眼底。不是因为站在高处，而是这里一马平川，视野太好了。

这座都城遗址没有后代建筑的迭压，后世覆盖土层仅10-30厘米，从而成为保存好、破坏少的元代都城遗址。元中都与元大都一样，均为三城相套、中轴对称、工字大殿等。典型的回字形城郭。通往主大殿的中央御道，由黄色龙纹砖铺建。

宫城南门面阔88米，3个门道，地面铺玄武岩条石，为三观二阙三门道木结构的过梁式宫门，目前仅留存底部巨大石基。看到元中都博物馆里的复原图，更体验到“三观二阙三门道”的雄伟。

宫城是元中都的核心部分，有四门和角楼。宫城内显露地面的有27处建筑遗址。宫城中心大殿的台基分为两层，呈工字形，自南而北由月台、前殿、柱廊、寝殿、东西夹室和香阁组成，下层为宫阙回廊，共有7条上殿坡道。

中心大殿北侧没有门，也没有上殿通道。不设北门可以防止冬季北风直灌入殿内，而夏季殿内不需南北通风就很凉爽，这显然是因地制宜的建筑理念。

中心大殿很高，各处回廊外部下方布满汉白玉螭首。回廊各处90度拐角的角部螭首极为珍贵，身躯前扑、头部高昂、双角贴颈、两耳后振，双前脚用力后登。这种蓄势待发的凶猛力量感，把游牧民族特有的气息表现得淋漓尽致，堪称元代雕刻极品。

宫城中心大殿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青石六六幻方，刻有古印度-阿拉伯数码，蕴含着精妙的数学原理。幻方石板是我国数学上应用阿拉伯数字的实物记录，也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元中都宫城的角楼颇为特殊和精致，是奇特的“三出阙角楼”。目前挖掘和整理好的是元中都宫城西南角的角楼。由于有一定难度，对角楼的发掘历经1998-2000年3年才大致完成，出土了大量形制巨大的琉璃陶龙、凤、海马、行什等屋脊部装饰构件和浮雕龙纹的瓦当、滴水。这些建筑构件均体现了角楼的皇家性质。宫城西南角楼残存台基高5米多，最大宽度16米，双向三出阙的墩台形制，夯土外包砖。角楼台基平面呈曲尺形，从宫城西南角起向东北呈三级折后分别与宫城的南墙和西墙连接。富丽堂皇的屋顶装饰，在视觉上的确给人气魄雄伟之感。

元中都为考古、古建、史学界提供了多项难得的研究实证：“工”字形中心大殿，“三观二阙三门道”梁柱结构的南门，奇特的“三出阙”角楼……

探寻汉代戍边吏卒的精神世界

何问

边塞大漠揽孤烟苍凉。2000多年前，当屯田戍边的古人面对苍茫无垠的边塞，他们何以寄情？一枚枚简牍诉说答案：读书练字、涂鸦、和友人传书。

甘肃省河西走廊历史上地处屯戍边塞，因此散落在河西深处的简牍大多是与古代军事屯戍相关的文书记录。从茫茫“简海”中，考古工作者梳理出不少艺术典籍和汉代戍卒对这些经典篇章反复学习的记录。

西北不产竹，因此竹简较少，汉代居延地区出土的一枚《仓颉篇》简不仅材质为竹，且引人遐想。这枚简牍为两面书写，共存59字，是目前发现的西北汉简中《仓颉篇》单简字数最多的一枚。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介绍，从字迹来看，第一面字距较小，第二面书写逐渐变得草率，简末“赏赏”二字甚至不是《仓颉篇》原文。“我们推测此竹简或许是某个来自南方内郡的戍卒从家乡带来边塞的，其闲暇之时在竹简上书写曾学过的《仓颉篇》，可能因为幼时学习不太认真，故有些词句记不清楚，写到后来就草草地上

‘赏赏’二字。”肖从礼说。肖从礼表示，抄写有《孝经》《论语》《仓颉篇》《急就篇》等内容的残简在西北各边塞遗址均有发现，这些简文应该都是边塞戍卒习诵抄写蒙学读物的习字简。“随着人群迁移，中华典籍也向西传播，这也足以说明汉代思想统一进程的发展。”

除了网头读书习字以外，这些久居边塞的戍卒们也会将塞上生活的乏味苦闷与友人诉说。河西走廊出土的大量私人书信便是折射他们内心世界的窗口。

“伟卿足下毋恙，叩头，闲者起居无它，甚善，贤独赐正腊……丞问起居燥湿，叩头。伟卿强饭厚自爱，慎春气，且莫尽真不久，致自爱，为齐数丞问雨君成起居，言归……请，叩头，因为谢。驛北尹衡叩头，塞上诚毋它可道者……”

肖从礼介绍，这枚出土于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汉简，是尹衡写给伟卿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的驛北，在当时属肩水候官管辖，尹衡在居延戍边，伟卿可能是尹衡老家之人。信中多处表达了尹衡

对伟卿的殷切问候，如“起居燥湿”“强饭厚自爱”“慎春气”等，都是汉时书信中寻常问候用语。尹衡在信里的一句“塞上诚毋它可道者”，道出了唯有在给朋友写信时，才能打发边塞生活的乏味，聊表思乡之情。

除文字记录以外，有的吏卒在清闲之时，也会用“涂鸦”来打发时间。

这枚出土于肩水金关遗址的简牍正反均绘有能清晰辨出的马，两幅画面相对，马儿低头腾跃奔跑的形象十分生动。肖从礼说，这表明涂鸦者具备一定的绘画水平，同时对马匹的奔跑动作也很熟悉。

“边塞吏卒远离故土守土担责，展现浓厚家国情怀，但在闲暇之余还能寄情读写绘画，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文化素质，说明了汉代对文化和教育的重视和普及。”肖从礼说。

甘肃共出土简牍6万余枚，其中汉简占到全国总数一半以上，对于研究秦汉及魏晋时期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据新华社电）



元中都遗址是河北省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时代比较单一、后期破坏最少的元代都城遗址。图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元中都遗址一角。